

二十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

鲍厚星 陈立中 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长沙 410081)

提要 二十世纪的湖南方言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世纪初期到四十年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时期;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大约十年时间,是以语音为重点的普查时期;第三阶段从八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纪末期,是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关键词 湖南方言研究 转变时期 普查时期 全面发展时期

壹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时期

1.1 开始用现代手段调查研究湖南方言 早期研究方言的学者一般是利用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来研究寻求古今语言文字嬗变的轨迹。杨树达从 1925 年开始陆续发表考证长沙方言的文章,后来形成《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见《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共考证长沙方言词 244 条,考证的本字多数被后人采纳,影响深远。1934 年到 1935 年《海王》期刊分 42 期连载了异人撰写的《楚语研究》,对湘方言的许多词语进行解释和考证,内容相当丰富。

1935 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董同和、杨时逢等对湖南方言作了普遍的调查。一共有七十五个调查点。大约是一县有一点,或县城或在某乡。这次调查的成果由杨时逢整理成《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 年在台北出版。调查采用国际音标记音,注重活的口语,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注意比较不同方言点材料的异同,探讨古今语音的演变。这次调查对湖南来说,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方言的开创性的工作,无论从它的规模、方法,还是成果、影响来看,在湖南方言研究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37 年 8 月长沙文印书局石印出版了李旦冀编著的《湘音检字》。作者虽未就湘音的具体地点作出说明,但从全书所列字音分析归纳,可以看出本书记录的是长沙方言音系。本书借鉴了中国传统韵书的体例,将湘音分为 19 韵,每韵以所举代表字表示统领的音节。正文后的“湘音补遗”反映了假摄字和梗摄字等的文白异读情况。“湘音国音差异之统系”列举了二十三项差异,例如阳平送气与否、n 与 l、ŋ 的分混、尖团音的分合、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的分合、f 与 x 的分混、ŋ 声母与鼻化音的有无、前后鼻音韵尾的分混等等,观察入微,概括全面。作者还特地谈到了当时长沙语音中“被视为特殊之俗音”的一些问题,例如“唐谭不分”,“杨言不分”等

* 本文曾在 1999 年 11 月 5 至 8 日于桂林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此次发表时作了修改。

鲍厚星,生于 1937 年,湖北黄陂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东安土话研究》、《长沙方言词典》(合著)等著作,并发表过若干重要论文。陈立中、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等。另外,本书主要记录读书音,去声只有一个,不分阴阳。

1.2 湘方言地位的确立是方言研究逐步深入的必然结果 近代学者最先给汉语方言分区的是章太炎,他把汉语方言分为10类,其中湖南自为一种,而湖南的沅州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合为一种。(见《章太炎文钞》卷二)这种分类虽然注意到了湘西地区说西南官话的事实,但对湖南其他地区的方言状况缺乏清楚的了解,因而笼统地归为一类,《章氏丛书》中检论卷五《方言》又把汉语方言分为9类,把湖南与河南自开封以西,汝宁、南防等处,及湖北沿江而下至于镇江合为一种,显然与湖南方言的事实面貌相差很远了。

后来黎锦熙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二系。湖南方言被分为东、西二部:东部与湖北东南角、江西的南部归为江湖系;西部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北部归为金沙系。(转引自王力《汉语音韵学》第572页)这种划分也显然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

直到1934年赵元任为上海《申报》60周年纪念印行的《中华民国分省新图》中所提供的语言区域图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湘方言的地位仍未被确立。

1935年秋天的调查终于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湖南全省的方言“是相当复杂”的;“一般人总觉着长沙话就是湖南话”,其实,“湖南话并不全是长沙话。”(《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序)。

1937年李方桂把汉语方言分成八区,“湘语”第一次被作为独立的一区正式提出。(原载Chinese Year Book p. 59-65,上海商务印书馆)赵元任也在40年代以后,对自己在1934年提出的九区说作了修订,把“湘方言”作为独立的一区。(Yuen Ren Chao: *Cantonese Primer* P. 13,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New York, 1969)。

“湘方言”地位的确立使人们能正视湖南方言内部的差异性,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

贰 以语音为重点的普查时期

2.1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普查 1956年4月湖南省教育厅根据上级的指示,抽调13个中学教师,委托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负责培训,然后分散到全省各地进行汉语方言普查。他们调查了48个方言点以后,7月回到长沙写出调查报告27个,学话手册14个。1957年以后,方言普查工作由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负责,当时曾组织20多个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调查了21个方言点。以后由彭秀模、曾少达两位专职老师进行补充调查。到1960年6月共调查了87个地点(当时有78个县,12个市)的方言,其中79个地点有同音字表。

1960年9月石印出版了《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初稿)》。这个普查总结用了主要篇幅对湖南方言的声调、声母、韵母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比较。编者根据多地方音特点的比较和综合印象,把湖南方言分为三个区:第一区主要包括湘水流域和资水流域。一般有5个或6个声调,去声分阴阳;古浊音系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保留得比较完整,部分地区浊音清化,不论平仄,一律读不送气清音;单元音韵母多,元音鼻化现象比较突出。第二区分布在湖南西北部 and 南部一带。一般4个声调,去声不分阴阳,入声一般归阳平;古全浊声母清音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复韵母韵尾一般都完整地保存着。第三区在湖南东部形成一个狭长地带。一般是5个声调,有的多至7个声调,去声一般不分阴阳,入声多保留,有的还有塞音韵尾;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均读送气清音;复元音韵母攸县以北多,以南少。全书还有两个附录:其一是湖南方言词汇,比较了全省各方言点173个词语的对应说法;其二是湖南方言地图,包括分区参考图1幅,声调分析图11幅,声母分析图13幅,韵母分析图6幅,其他2幅,共计33幅。

这次普查工作在语音的调查与分析比较上成绩突出,为湖南方言的分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该说,它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这份普查总结已经成为珍贵的具有重要文献

价值的湖南方言史料。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对湖南各方言的了解不很平衡,对湘方言和西南官话的了解比较多,对客赣方言和双方言区的复杂状况了解比较少,甚至还缺乏一些调查。和语音调查相比,对词汇和语法的调查研究相对薄弱。

2.2 普查总结报告以外的研究成果 杨耐思 1957 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的《临湘方言里的动词补足语》,是比较早的研究湖南方言语法的论文。1960 年发表的唐作藩的《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和向熹的《湖南双峰县方言》(见《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0 年 8 月)是这个时期对单个方言进行全面描写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1960 年第 1 次出版的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对长沙、双峰等方言进行了全面的概要分析。1962 年第 1 次出版的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音字汇》收录了长沙、双峰两处方言 2 千多个字。

1957-1961 年还发表了一些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比较的论文和著作。论文例如:李遇恩《长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周另吾《新化话与普通话的差别》、杨道经《湖南临湘方音与北京语音的比较》,刘泾选《岳阳南乡的土音》。著作例如:周铁铮《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李仲平《邵阳人怎样学普通话》,罗祚韩《常德桃源人怎样学普通话》,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普查组《湖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另外,这个时期杨时逢在台湾发表了《长沙音系》、《湖南方言声调的分布》、《湖南方言极常用的词汇》。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湖南方言研究成果。

叁 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方言》的创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国家级课题任务的带动,湖南方言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1980 年底,湖南省语言学会成立文改与方言研究会。1981 年 11 月李永明、鲍厚星、胡正微、伍云姬等参加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当年年底召开了首届湖南方言研讨会,此后每逢省语言学会举行年会,同时就举行方言研讨会。1983 年和 1985 年先后出版两本《湖南方言专辑》,正式发表 40 篇论文。1983 年湖南师范大学成立了湖南方言研究室。1989 年湖南承办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自 1983 年起,湖南方言工作者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课题,为《中国语言地图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湘南土话》、《湖南南部方言调查报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等国家级项目贡献了力量。湖南师范大学在八十年代初期开设汉语方言专业硕士点的基础上,又在 1999 年开设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点,同年招收了第一批方言专业博士生。

这一时期湖南方言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分区研究;(二)单点研究;(三)专题研究;(四)方言志编纂。

3.1 分区研究 湖南境内是多方言地区,由于各方言相互之间的影响、渗透和特殊的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方言的分布(特别是在那些边缘地带)呈现出复杂状态。有关湖南方言分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湖南方言分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

杨时逢在《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中把湖南省的汉语方言(材料为 75 个点)分为 5 区,作者认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五区“很像西南官话”,第三、四区作者指出都有官话、土话并存的局面,情况较为复杂。其作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词类等区别,来作分区

的条件”。分区结果学术界一般认为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出入。

日本学者辻伸久在《湖南诸方言の分类と分布——全浊声母变化に基づく初步的试み》(1979)中利用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的材料,以单一的语言特征将湖南汉语方言分为四种类型,即江西型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新湘型湘方言。

周振鹤、游汝杰在《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1985)中也是根据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的材料进行分区的。他们参照数学上的集群方法,先找出各方言点之间方言特征的接近程度并初步分区,然后再参考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进行局部调整。他们把湖南方言划分为五个片:①西南官话片②湘语北片③湘语南片④赣客语片⑤混杂方言片。

李蓝的《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1994)关于湖南方言的分区仍以杨时逢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要依据,采用一种“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即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据此,把湖南方言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独立型方言。

鲍厚星、颜森关于湖南方言分区的意见开始发表于《方言》1986年第4期,曾把湖南方言分为6区:①湘语②赣语③客家话④江淮官话⑤西南官话⑥乡话。后来在《中国语言地图集》正式出版时,原“江淮官话”的“常鹤片”改属西南官话范围。

我们对湖南方言的分区,基本上赞同鲍厚星、颜森1986年提出的六区说,对湘西一带部分市县的方言系属再作一些调整,即把吉首、保靖、花垣、古丈、沅陵等地方言划入西南官话,辰溪、泸溪、溆浦三县方言仍留在湘语范围内,单独为一片(详见《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前言“湖南汉语方言概况”)。我们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基于以下几点:

①调查的方言点有了变化。已经不是75个点(杨时逢),也不是87个点(普查总结),而是上百个点了,这大多因为行政区划有了新的变动,或者是出现了以往分区中未曾揭示的空白点。我们对这些都逐一进行了调查。

②对原有的点尽可能地进行了实地核对。我们认为既要重视过去分区的成果,又不要囿于成说。一旦发现需要进行修正的地方就给以修正。比如岳阳、安化、隆回、绥宁、洞口、平江、浏阳、茶陵、攸县、酃县、安乡等十来个县市的方言都不宜于单一地划入某一方言区,而需分别情况划分。

③本省各地的方言工作者熟知当地方言的特点和一些难以从文献中了解到的历史人文因素,他们对我们的分区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3.2 单点研究 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方言普查工作以后,学术界对普查的材料及其成果已经感到不满足了。对一个个方言代表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逐渐被人们重视。于是一批单点研究的专著先后应运而生。

从1986年到1996年,这一期间陆续出版了下列著作:《衡阳方言》(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华容方言志》(吴泽顺、张作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常德方言志》(李永明,岳麓书社,1989)、《长沙方言》(李永明,湖南出版社,1991)、《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湖南安乡方言》(应雨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安仁方言》(陈满华,北京语言学院出版,1995)、《资兴方言》(李志藩,海南出版社,1996)。

其中《衡阳方言》的出版,是第一次为湘语提供了有代表意义的专著,也是本世纪第一部对湖南一个单点方言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研究员黄雪贞的《江永方言研究》是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成果之一,全书对江永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作了详细的纪录和描写,与上述李永明的《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都是研究湘南土话的重要的代表作。《湖南安乡方言》是应雨田长期潜心研究的成果,成为了解湖南境内西南官话的重要著作之一。

推动单点研究使其形成强劲势头的是 1998 和 1999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集中推出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在为丛书所作的序中说:“近年来方言著作出版的多了。就各县(市)的方言志而论,山西省已经出了三十几种,山东省已经出了十几种。现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丛书的筹划工作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的热心关注、具体指导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全力资助,并被列入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的课题。

这套丛书包括:《浏阳方言研究》(夏剑钦,1998)、《益阳方言研究》(崔振华,1998)、《东安土话研究》(鲍厚星,1998)、《邵阳方言研究》(储泽祥,1998)、《常宁方言研究》(吴启主,1998)、《祁阳方言研究》(李维琦,1998)、《新化方言研究》(罗昕如,1998)、《常德方言研究》(郑庆君,1999)、《沅陵乡话研究》(杨蔚,1999)、《涟源方言研究》(陈晖,1999)、《宁远平话研究》(张晓勤,1999)、《长沙方言研究》(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1999)、《宜章土话研究》(沈若云,1999)、《溆浦方言研究》(贺凯林,1999)、《衡山方言研究》(彭泽润,1999)。此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韶山方言研究》(曾毓美,1999)和《岳阳方言研究》(方平权,1999),也可列入丛书。

可以说,丛书的架构颇具规模。它不仅内容丰富,语料翔实,而且在选点上注意覆盖湖南各种方言类型,使全套丛书成为能够反映湖南方言基本面貌的一个有机整体。丛书的布局是,主体为湘语(选了长沙、益阳、衡山、邵阳、涟源、新化、祁阳、溆浦等点,长益片、娄邵片和辰溆片均有反映),官话和赣客作“西翼”(选了常德和浏阳、常宁,点虽不多,却具代表性),土话和乡话给以适当突出(选了东安、宁远、宜章和沅陵 4 点,湖南土话和沅陵乡话都是《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未分区的非官话,为学术界所特别关注,因而有所突出)。

《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湖南方言研究的成果。丛书与其他方言著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整个湖南方言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因此,它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鼓励,张振兴先生赞扬它为“语言学的重要收获”(光明日报,1998—10—26(7)),并指出“湖南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湖南师范大学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中心之一”(《韶山方言研究》序,1999)。

3.3 专题研究 这一时期的方言研究的特点是“向纵深发展,向全面推进”。单点研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各种专题的研究,这多数是论文形式,也有一部分专著。为了说明的方便,可以概括为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及其他研究。

⊙ 语音研究 对于方言研究来说,语音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语言构造是有规律的,语音构造的规律尤其明显。语言是变的。语言演变是有规律的,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十分严格(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李荣《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方言词汇语法的研究都要以方言语音为依托。

首先是关于方言音系的描写研究。仅仅在《方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有 10 多篇,例如

《湖南邵阳方言音系》、《湖南城步(儒林)方言音系》(鲍厚星)、《湖南江永方言音系》(黄雪贞)、《湖南娄底方言的同音字汇》(李济源、刘丽华、颜清徽)、《湖南桃江(高桥)方言同音字汇》(张盛裕、汪平、沈同)、《桂东方言同音字汇》(崔振华)、《湘潭方言同音字汇》(曾毓美)等。

其他刊物发表的这类研究影响较大的有:《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王辅世)、《南岳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来源》(郭锡良 1993)。

王辅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目,引来了关于乡话(或瓦乡话)的进一步调查和研究,鲍厚星、伍云姬的《沅陵乡话记略》(1985)和杨蔚的《沅陵乡话研究》(1999)是这一研究的补充与发展。

其次,关于方言语音突出特点、新老差异、文白异读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论文,例如《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陈蒲清 1981)、《湘方言中的舌面前塞音声母》(钟隆林、胡正微、毛秉生 1993)、《长沙方言的新派与老派》(鲍厚星 1983)、《长沙方言去声字的文白异调》(江灏 1981)、《耒阳方言的文白异读》(钟隆林 1985)、《冷水江方言的文白异读》(李亭玉 1985)等。

建立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是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它因此而被纳入“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音库计划收录 40 种汉语方言音档,每一个地点方言的音档都有一盒录音带,包括语音系统,常用词汇,构词法举要,语法例句、长篇语料 5 部分。并附有本区方言记略和所录方言概述以及同音字表。湖南承担了两项,即《长沙话音档》(鲍厚星 1997.5)、《湘潭话音档》(曾毓美 1997.12)。

湖南省公安厅根据语言识别工作的需要,在 1988 年聘请专家培训方言调查骨干,经过数年调查、整理、审订,终于在 1993 年 10 月正式出版了《湖南汉语方言音字汇》。该书从湖南各种方言中选出 22 个代表点,每个点选用 2962 个字比较,正文前有各点方言音系简介。

③ 词汇研究 词汇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期由湖南省方言研究会主编的两本《湖南方言专辑》所发表的 40 篇文章中有四分之一是关于词汇研究的,例如《长沙方言词汇》(向方炎)、《耒阳方言词汇》(钟隆林)、《双语区的宁远方言词汇》(李永明)、《平江方言词汇》(张胜男)等。1984 年收单词和短语 12000 条左右的《衡阳方言词汇》(李永明)出版。1990 年《方言》1、2、3、4 期连载了《湖南娄底方言词汇》(颜清徽、刘丽华),1991 年《方言》1、2、3 期连载了《湖南江永方言词汇》(黄雪贞)。

有的文章把方言词汇比较和方言分区结合起来,例如《方言词汇比较与湖南方言分区》(鲍厚星 1985)。

日本学者辻伸久 1987 年出版了《湖南省南部中国语方言语汇集》。

在前面说的 20 多部单点研究的专著中包含了大量的方言词汇材料。

“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 种分卷本的出版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件盛事。湖南完成了其中的两部:《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 1993 第一版,1998 第二版)、《娄底方言词典》(颜清徽、刘丽华 1994 第一版,1998 第二版)。作为分卷本词典都必须服从统一的规划,内容分为三部分:主体是词典正文,前面有引论,后面有义类索引与条目首字笔画索引。都要求为综合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准备条件,并充分反映本方言的特色。目前正配合这部大词典的第二期工程,即 1200 万字的综合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做好规定完成的有关工作。

④ 语法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方言语音和词汇的研究,但较长时期以来湖南方言研究中的语法部分是一个薄弱环节。

仍以两本《湖南方言专辑》为例,40篇文章中属于语法方面的只占9篇,其中李永明、张大旗、崔振华各占2篇。李永明是《长、衡方言中某些有特色的形容词》、《衡阳方言人物称谓的词及其构词标志》,张大旗是《湖南临武话的一些语法特点》、《长沙话的特殊语序现象》,崔振华是《长沙方言中的“起”》、《益阳方言的几个词缀》。

《方言》上发表的关于湖南方言语法的文章较少,只有下列几篇:《长沙话“得”字研究》(张大旗 1985)、《嘉禾土话“一、二两”的读音及用法》(谢伯端 1987)、《娄底方言的两个语法特点》(颜清徽、刘丽华 1993)、《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伍云姬 1994)、《湘潭方言的代词》(曾毓美 1998)。其中《长沙话“得”字研究》影响较大。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引言;“得”用作结构助词;“得”用作助动词;“得”用作介词;“得”用作动态助词和形容词;“得”用作语气助词;“得”用作构词成分和衬字。全文长达2万4千多字,是《方言》上少见的长篇论文。该文之后还加有200字的编者按,其中指出:“长沙话轻音节‘得’[·tə]的语法功能十分纷繁,显然代表好几个不同的语素。本文按照‘得’[·tə]字的分布和功能初步归纳为若干类。”

《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1988)和第五期(1995)先后发表了《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周定一)、《常宁方言的语法特点》(吴启主)。前一篇在词法方面,谈了名词词缀的特点和使根词生动化或强化的几种语音附加成分。在句法方面主要是谈助词的一些用法,也包括个别副词和个别句式的特点。后一篇在词法方面,记述了该方言词类系统的特点。在句法方面从语序、句型、句式、句类等几个方面记述了该方言的某些突出的特点。

还必须看到,在这一时期出版的20多部单点专著中,都把语法研究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从构词法、句法、虚词等多方面来进行研究,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比较突出的例如《衡阳方言》、《安仁方言》、《益阳方言研究》、《常宁方言研究》、《常德方言研究》、《新化方言研究》、《长沙方言研究》、《衡山方言研究》等。胡明扬在《安仁方言》序中指出:“如果说现代汉语语法几十年来这么多人一直在研究还有不少问题没有研究清楚,那么方言语法研究就更不可能要求一个人一次就研究清楚。我认为,只要能如实描写,多提供例证就可以了,怎样分析,怎样解释,允许不断修正,不断深入。”

伍云姬关于“湖南方言语法系列”的构想有独到之处,她认为“不管是从地理语言学、类型的角度,还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语法研究都是不应忽视的。湖南集湘、赣、客等方言于一地,正好处于南北方言的中间地带。要解释某种句式或某种语法现象的断代差异或历史变迁,常常要借助这个中介。”该系列得到了湖南方言工作者的热心支持,目前计划出版5集:第1集《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96年已经出版),第2集《湖南方言的介词》(1998年已经出版),第3集《湖南方言的代词》,第4集《湖南方言的语气词》,第5集《湖南方言的语序和句式》。正在编写或出版中。

④ 其他研究 80年代湖南省及各市、县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地方志编纂机构。各级地方志编纂部门对方言志的编写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有的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聘请方言学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编写方言志。到目前为止,各市、县志都已基本完成编纂出版工作。在这些志书中都有“方言志”的内容。方言在这些志书中或为独立的一卷或与风俗、民情、宗教等合为一篇。它们大多用国际音标记录,不少方言志注重境内方言的分区、比较,例如《常德地区志·民俗志·方言志》(罗祚韩)、《浏阳县志》(夏剑钦)、《衡山县志》(毛秉生)、《湘潭市志》(曾毓美)、《零陵县志》(彭泽润)等等。有的还有语法特点分析和标音举例,个别的还附有“次方言区示意图”,例如《桂阳县志》。有的用汉语拼音将就记录语音,价值不大。各市、县志

书中的“方言”部分虽然体例上参差不齐,篇幅长短不同,编写人员情况也不同,但是它们无疑是研究湖南方言的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方言志中也有以专著形式单独出版的(见前面)。由李永明、鲍厚星共同主持即将出版的《湖南省方言志》,凝聚了湖南省内一批方言研究学者多年的心血。全书篇幅达120多万字,分“前言”、“概述”、“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土话、乡话”、“湖南各方言点声调字对照表”、“湖南各方言点单字音对照表”和“湖南各方言点词汇对照表”等十个部分,采取重点与非重点结合的方法,对22个重要方言点的概况、语音系统、常用词汇、语法特点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对100多个县市方言点的声调、单字、词汇材料进行了比较。

On the Research of Hu'nán Dialects in the 20th Century

Bao Houxing, Chen Lizhong and Peng Zerun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Hu'nán dialects in the 20th century may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o the 1940s, which is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to the modern one; the second period, with a span of about ten years, starts from the mid-1950s, which is the time of general fieldworks on phonetics; the third period i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o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dialectural research in all aspects.

Key words the research of Hu'nán dialects, transforming period, the period of general fieldwork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in all aspects.

(本文责任编辑 周 磊)